

閩方言音韻層次的時代與地域

張 光 宇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及語言學研究所

摘 要

閩方言文白異讀中的音韻層次分析是所有漢語方言最複雜的。本文以廈門方言的韻母文白異讀為核心，參酌古代文獻和方言地理演變類型，指出閩語在長期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包容了 (1) 古中原，(2) 古江東，(3) 唐宋文讀系統，以及 (4) 客贛方言的成分。結論認為：

- (1) 方言地理演變類型有相當大的穩固性。由於這種穩固性，層次分析才有可能。從上古到中古存在比時代差異更大的類型差異。
- (2) 文白異讀的存在說明語音系統有“綜合”的可能，如果一個系統進入另一個系統一定要經過“折合”就不會有所謂文白異讀。
- (3) 古閩語重建可以有兩個含義：如果目的是要指出地域來源，就得為每一個層次定一個來源形式；如果目的是要決定漢字音讀的終極來源形式，每個漢字都只能付與它一個固定的形式，儘管它在不同的層次中有不同的形式。

一、引 言

傑出的美國語言學家羅杰瑞在發表他的〈閩語詞彙的時代層次〉(Norman 1979)以前，即已進行過所謂“原始閩語”的局部重建(Norman 1973; 1974)。他的重建工作可以說是傳統歷史比較法的典型演練，他把不同的音韻層次壓縮到同一個平面從而得出了相當不諧調的結論。例如他所謂的閩北方言的第九調(陽平乙調)，經過

* 本文的寫作得自張次瑤(琨)先生的啟發。原稿係為參加第20屆國際漢藏語言學會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1987年8月21日~23日)而寫，後因簽證延宕未克赴會宣讀。改稿得到清華學報評審意見，付梓前夕又蒙福建師大中文系李如龍教授惠賜審讀意見，併此致謝。1989年3月31日。

平田昌司 (1986; 1988) 的辨析，認明實係來自吳語；以陽平乙調為據所做的聲母擬測因而基礎動搖，不盡可信。其它方面像把古次濁聲母讀h-、s- 聲的古音來源定為清鼻音，清邊音也都問題重重（張光宇 1989b）。假使這些關於聲調、聲母的構擬不符他的以韻母為立論基礎的層次學說，應無足稱奇。然而，他的所謂“原始閩語韻母系統” (Norman 1981) 出在以方法論為重心的層次學說之後，竟也沒有先就層次分析問題加以具體的說明，就逕直地把所有材料放在一起進行重建。如此一來，不免引起一系列疑問：什麼是一個層次？層次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不同的層次在古閩語的重建上應該如何處置？

唐代以前，福建的開發史是一個和平與漸進的過程 (Bielenstein 1959)，閩境也從來不曾做過中國歷史重大事件的主要舞台。因此，要從移民浪潮中去建立詞彙和音韻的時代層次並不容易。儘管如此，羅杰瑞還是大體設定了漢、南朝、與晚唐三個時代層次，並嘗試以三個詞彙—音韻層次搭配其上。只要稍微檢驗一下他所陳述的歷史故事與音韻—詞彙層次之間的關係，就可以看出那種搭配是鬆脫的。他的注意力深為“時代”所吸引，對地域來源的說法不免顯得即興而倉促，模稜兩可地說那些層次“來自不同時代的標準語”，但也“可能來自不同區域的方言”。從語言史過去的業績看來，專注“時代”而輕忽“地域”無寧是傳統的一部分。明乎此，我們對羅氏的貢獻應無由妄誕。語言存活有時空兩面，即便承認他的三個時代層次確切無訛，下一步工作自然落到搜尋地域來源上。

關於層次分析，在羅文 (1979) 以前有英國的漢學家唐納 (Downer 1973) 教授曾經探討瑶族勉語漢語借詞的問題，嘗試運用若干標準去剖析、辨認其中蘊藏的粵語成分及西南官話成分。他所指認的一個層次一定具備若干音韻特徵。無音韻特徵即無層次可言，這才是具體、科學的層次分析。不過，細究起來，唐納所處理的借詞問題時代比較晚近，借詞現象發生在漢語與非漢語之間，他的層次（也就是來源方言 source dialect）辨認實際上相當直截了當而沒有遭遇太大的難題。對比之下，閩語的層次分析複雜遠甚於勉語的漢語借詞，因為除去晚近移借問題而外，還有不止千年的現象。在這種境況底下從事層次分析並辨認地域來源，顯然得有豐富的想像及透視眼光。本文試圖結合古代文獻和方言地理類型探討閩方言的音韻層次。敬希海內外方家有以指正。

二、層次的不等性

音韻層次分析的工作性質彷彿考古地下挖掘。然而，考古層積的縱剖面是立體結構，年代層次井然有序；音韻層次不然，多少年代的音韻層次可以同時存活於一個平面。音韻層次的辨析就是要在平面的系統中透視其立體本質。在追求科學性及公式化的工作要求上，首先遭遇的難題是“層次的不等性”。底下舉例嘗試說明之。

齊韻在閩方言裡有好幾種語音形式：-ai 與 -i 普遍見於福州、建陽、潮陽、廈門、漳平；-e 見於福州、廈門、漳平^(註1)；-oi 見於潮陽、建陽；-ue 見於廈門。這五種韻母形式在閩方言的分佈可分為三組^(註2)：

齊韻	ai	i	e	oi	ue
廈門	+	+	+	-	+
福州	+	+	+	-	-
漳平	+	+	+	-	-
建陽	+	+	-	+	-
潮陽	+	+	-	+	-

第一組是廈門，具有四個韻母；第二組是福州、漳平、具有三個韻母；第三組是建陽、潮陽，具有三個韻母。這種分佈情況清楚地顯示著一些空檔——並非五個韻母都整齊劃一地見於所有方言，亦非每個方言都有相同的音韻內容。這是具有代表性的層次不等的例子。

類似於齊韻所體現出來的層次不等性普遍存在於閩方言的聲調、聲母、和韻母系統上：

1. 在聲調系統上，龍岩、莆田方言的入聲有文白之別，舒聲調沒有。因此分析起來，入聲可分兩個層次，舒聲僅有一個層次，這是兩方言內部的層次不等性。別的方言在有無入聲文白區別上與龍岩、莆田也不相等。建陽、松溪方言具有所謂的第九調，也就是第二類的陽平調（或稱陽平乙，以別於稱做陽平甲的一般陽平調

- (1) 漳平（永福）方言沒有單獨出現的 -e。從漳系方言的比較看起來，漳平的 -ei 可以視為 -e 的變體。
- (2) 這些韻母形式可以視為兩條發展線上的產品：一條是 *ai → e → i，一條是 *ai → oi → ue。參看張光宇 (1985)。

）。這種特殊的調類不見於多數閩方言。閩語各地方言的調類也不盡相同：閩中方言有六個調，潮汕一帶的閩南方言有八個調，一般閩方言有七個調。（陳章太·李如龍1982）

2. 在聲母系統上，文白異讀並非普遍見於《切韻》所有的聲類。以閩南方言爲例，古清音（尤其是塞音）聲母如“幫、滂、端、透、見、溪、精、清、影”一般只見一讀而沒有文白差異（張盛裕 1979；Chang Kuang-yu 1986）。其它具有文白之別的聲類通常只有兩讀，像“匣”母那樣具有四讀（如廈門“猴”kau²⁴，“環”khuan²⁴，“鞋”ue²⁴，“寒”han²⁴（文），kuã²⁴（白））的屬於個別現象。

3. 在韻母系統上，文白層次的不同性尤爲顯著。A. 閩語各方言韻母數目相差極爲懸殊。例如閩北的松溪只有28個韻母，閩東福州有45個韻母，閩南系的潮陽有90個韻母。整個閩方言的趨勢顯示，韻母數由南望北遞減。B. 閩北方言如松溪、建甌、政和等沒有塞音尾韻母，建陽、浦城、崇安只有喉塞尾韻母，閩南方言通常有四種塞音尾(-ʔ, -p, -t, -k)韻母。C. 韻母文白層次多寡和韻母數大小關係密切。閩南方言韻母的文白層次比閩北方言豐富，正與韻母數大小相應。D. 在同一方言內，有的《切韻》韻類只有一種韻母形式，有的韻類有兩種或兩種以上音讀。

總起來說，層次不等性有區域性的，有音類之間的。區域之間的音韻層次不等係方言發展不平衡的反映，音類之間的層次不等可能反映著來源方言的音讀異同。不管是區域間的還是音類間的層次不等，我們都可以從“層次重疊”或“取代作用”去加以理解。

所謂“層次重疊”，指的是不管來自那個層次（包括時代和地域）音讀都相同。唐納分析瑶族勉語的漢語借詞中提到“化 hwaa 字音可以歸屬到任何一個層次”（1973: 12），即爲“層次重疊”的現象。廈門方言“邊”字白讀 pī，文讀 pien，聲母部份並無差異，也是“層次重疊”的現象。廈門方言麻韻二等可分爲 -e（白），-a（文）兩個層次，而先韻四等至少可以分爲二白 -aī，-ī，一文 -ien 三個層次，麻二所缺少的一個層次可以設想爲“重疊”的結果。

所謂“取代作用”，指的是較晚的音讀層次取代了較早的音讀層次。例如“齊”韻在廈門方言有 -e 一讀，但是不見於潮陽方言；潮陽文讀形式 -i 遍見於閩南方言（只有例字多寡之別）。從比較可知，潮陽較早的文讀 -e 完全爲晚近的文讀 -i 所取代。於是，潮陽就比廈門少了一個層次：

齊韻	-ai	-i	-e	-oi ~	-ue
廈門	+	+	+	-	+
潮陽	+	+	-	+	-

閩方言音韻層次分析假使不照顧這兩種因素，可能就會引起雜亂無章的情況。羅杰瑞 (1979) 在建構他的層次學說時，曾舉先韻天字為例做出如下的分析：

“天”	一層	二層	三層
將樂	thaī ¹	thieng ¹	thieng ¹
廈門		thī ¹	thien ¹
福州		thieng ¹	thieng ¹

其中，讓人困惑的主要有兩點。第一，將樂和福州二、三層完全同形（聲、韻、調皆無區別），何以分屬兩層？第二，他說他在原始閩語的重建時，以廈門的白讀（即劃歸二層的 thī）和福州的形式（即分歸二、三層的 thieng）為基礎去構擬 *thian 原始形式，讀者不禁起疑：到底他的二、三層如何界劃？

依我們的分析，上表應可改為如下格局：

“天”	-aī	-ī	-ien
將樂	+	-	+
廈門	-	+	+
福州	-	-	+

福州“天”字無 -aī (~ aing) 一讀，可是同韻“殿、墊”讀 -aing；廈門方言“天”字也無 -aī，可是同韻“蓮、前”讀 -aī（保存在地名“蓮河”和廈門市郊“殿前”）。就“天”字而言，廈門、福州的 -aī ~ aing 顯然是早被取代了。如果，詞彙證據（這是可能的）真足以支持將樂和福州二、三兩層的分別，從音韻的立場上看起來，就得說明那是“層次重疊”的結果。當羅杰瑞拿廈門的白讀 -ī 和福州的 -ieng 去構擬 * -ian 時，事實上他的三層次就被壓縮成為兩個層次了——將樂的 -aī 來自 * -an。這個例子充分表明一個矛盾現象，也是概念含混的結果。其實，關於“來源”形式的探討應該分從兩個角度去說明。就閩方言的立場說，三個層次代表三個不同的來源，三個不同來源的成分不能說是兩個來源，此其一。就漢字音讀的重建來說，歷史比較重建的結果只能有一個終極來源形式，此其二。因此，上述兩個來源形式的結論，既不符合音韻層次反映的閩方言形成和發展的事實，也不符合歷史比

較重建的要求。

從上述分析可知，比較單位的大小足以影響層次分析的結果。以單字為單位可以獲得“點”的認識，以單字所屬的音類為單位可以獲得“線”的瞭解，以相關的音類為考量的基礎可以獲得“面”的，也即“層次”的消息。一個層次應該是一個面，最大的面是方言所反映的“切韻”聲韻調的全體音讀特徵。由於層次不等性的客觀事實的存在，今天我們從事音韻層次分析有必要選擇定點（區域的和音類的）去做一番嘗試，如有不足再擴大比較範圍。經過比較，我們決定以文白現象豐富、複雜著稱的閩南廈門方言為探討地點，以“切韻”三四等韻的音讀為音類範圍。為了便於稱述和對照，底下列出相關音類（舉平以賅上，去、入）：

韻尾	四等	三 A	三 B
*ng/k	青	清庚	陽
*n/t	先	仙	元
*m/p	添	鹽	嚴

三、層次的分析

3.1 唐宋文讀層

韻尾	四等	三 A	三 B
舌根	-ing/k	-ing/k	-iong/k
舌尖	-ien/t	-ien/t	-ien/t
雙唇	-iam/p	-iam/p	-iam/p

在閩南方言裡，這一層音讀是最明顯而且內部最為一致的現象。這一層的特點是：A. 韻尾保存完整。B. 同攝三四等完全同音。C. 與唐五代西北方音、日語漢音、現代北京音非常近似。

梗山咸三攝三四等的主要元音在廈門方言分為三級高度：舌根尾前是高元音 -i，舌尖尾前是中元音 -e，雙唇尾前是低元音 -a。北京上述韻類範圍內韻尾只有兩種，元音高度區別也只分為兩級，顯然韻尾與元音變化具有密切的關係。雖然有此差異，

廈門文讀和北京今音同屬同攝三四等合流的類型。在漢語方言裡，客家梗山咸三攝三四等字（除去梗攝的白讀）的音讀和廈門方言如出一轍，其它方言音讀模式與北京比較近似。近似兼指韻類合併與相對的元音高低。

這種音讀類型分佈廣袤，可能是近代以前作為識字教育的工具而推展開來的，它的基礎是唐宋時期的讀書音，源於長安。史存直 (1985) 根據唐代北方七位詩人孟浩然、王維、李白、杜甫、韋應物、白居易、柳宗元的古體詩用韻情況得出總結說：“他們的用韻情況基本上與十六攝相符”（頁38），並認為這是唐代通語韻類劃分情況的反映。這應該就是宋元時代韻書“併轉為攝”的語音基礎——同攝三四等完全同音^(註3)。以此為據，把廈門文讀系統的來源推定為唐宋而下傳承不絕的讀書音，雖不中亦不遠。

這一層音讀何時傳進福建？文獻上未見明確記載。儘管如此，王育德 (1970) 和羅杰瑞 (1979) 傾向於把它歸功於王氏治閩 (909-945) 期間，大興文教。如果屬實，它在福建流傳已將近有千年歷史。這種讀書音的教育一直延續到民國初年國語運動推行之時，因為地方韻書的翻刻、重印直到光緒年間甚至民初還在進行。^(註4)

3.2 吳楚江淮層

韻尾	四等	三 A	三 B
舌根	ī, i [?]	ī, i [?]	-
舌尖	ī, i [?]	ī, i [?]	-
雙唇	ī, i [?]	ī, i [?]	-

這一層音讀在廈門方言的特點是：四等與三 A 韻的主要元音都是前高元音，陽聲韻帶鼻化，入聲韻帶喉塞尾。雖然也是合流，可是與文讀層在語音上有顯著的區別。音讀例證如廈門：天 thī55，年 nī24，扇 sī21，鄭 tī33，青 tshī55，添 thī55；鐵 thi[?]32，碟 ti[?]32，摺 tsi[?]32，舌 tsi[?]4。

類似的音讀模式在地理分佈上大約北起江蘇鹽城，南到浙江北部（寧波、溫州

- (3) “併轉為攝”以後的語音現象，或以為同攝一二等，三四等分別近似；或以為同攝一二等合流，同攝三四等合流。我們採取後一種看法。
- (4) 依筆者所見，《增補彙音妙悟》即有清光緒乙巳年 (1905) 廈門廿四崎腳會文書莊石印本刊行。在台灣則直到1970年還有影本問世。

位置稍南也具有類似音讀），東從松江（今歸上海市轄）起，中經蘇州，皖南（如銅陵）西到湖南如雙峰、婁底、臨武…等，大體就是吳楚江淮地帶。上列陽聲韻在這一地帶有的仍讀鼻化，有的鼻化已經消失。儘管有此語音細節上的差異，也無礙於把吳楚江淮視為一個方言連續體（袁家驊 1960:103，張光宇 1989c）。

關於古代文獻，山西聞喜人郭璞 (276-324) 在《爾雅·釋詁》注中有一條記載值得留意。他說：“南方人呼翦刀為劑刀”。郭璞是永嘉喪亂之際隨王室渡江的士族。他所說的“南方”即所謂江東。陳寅恪 (1956) 指出，當時南渡的中流士族大都住在都城附近的晉陵、京口（今鎮江以至常州）一帶。郭璞過江以後往來於長江中下游一帶，似乎在暨陽（今江蘇江陰附近）的時候最多。（周因夢 1956）明確一點說，郭璞所指南方當以這一地帶最為合理。注中“呼剪刀為劑刀”在音韻上有兩層含義：陽聲韻讀如陰聲韻，三等讀如四等。這項文字記錄不能充份顯示音讀實況，比方“剪”字是鼻化呢還是鼻化已經消失？元音方面彼此異同程度又如何？古音固不可確知，可是地理演變類型大有助於我們的理解。江蘇省和上海市一帶的方言顯示，“剪”字有 -iī（句容、揚州、高郵、鹽城、淮陰、泰州、如皋）；-ī（南通）；-ii（蘇州、無錫、常州）；-i（上海市、松江）等數種音讀類型。同時在上列方言裡，“劑”字都一致讀 -i。從兩字音讀的近似性著眼，可知郭璞實非無的放矢，應該說是確然有所聽聞。廈門音讀 -ī 當係來自鼻化那一派的江東音，江東鼻化丟失當係後來的發展。梗攝三四等在上述方言以 -in 為常見形式但不鼻化，有幾種可能的解釋：或者 -in 以文讀取代了更早時期的白讀 -ī，-i...等，或者進入閩境時就是 -in 再進行鼻化。

“吳楚江淮”是地理類型的名稱，作為層次音讀來源未免過於寬泛。因此，我們設想其起點應在金陵附近的“江東”。時代問題不易決定，因為江東音的特點在郭璞南下以前應該早已存在，絕不可能是郭璞南下後新生的現象。南北朝對峙時期，江南統歸南朝治下，建康（今南京）為彼時的首都和政教中心。這一層音讀移進閩境在南朝時期不無可能。如果屬實，那麼從較早郭璞的時代算起，它被引進福建已有一千六百年，從南朝末葉算起也有一千四百年。

“元、嚴”在吳楚江淮的音讀與四等、三 A 殊無二致，廈門方言今音罕見類似音讀，可能是被文讀取代了。“陽”韻不在這個類型的討論範圍內。

3.3 古中原層

韻尾	四等	三 A	三 B
舌根	aing/k	iang/k	iang/k
舌尖	ain/t	ian/t	ian/t
雙唇	aim/p	iam/p	iam/p

這一層音韻的特點是大體維持三四等韻的三向對立形態。反映這一對立特點的音讀模式可以建陽和廈門爲例：

*-ng	四等	三 A	三 B
建陽	-aing	-iang	-iong
廈門	-an	-iã	-iũ

其中四等韻的韻母特點還見於潮陽如“先”saĩ33，“肩”kaĩ33；廈門如“殿”taĩ33，“前”tsaĩ24，“蓮”naĩ24；福州如“店”taing113，“念”naing113。三 A 的特點在廈門是 -iã，如“聲”siã55，“燃”hiã24。三 B 的特點是帶後元音，如廈門“羊”iũ24，“歇”hioʔ32，建陽“怯”khio35。這種三向對立的音讀模型未見於其它漢語方言，幾可說是閩方言獨具的現象。

文獻上值得注意的是西晉時期最具古風的呂靜《韻集》。呂靜家居任城（今山東曲阜），他的韻類分合大約依據西晉洛陽的讀書音（張琨1987）。他的韻書大體三四等分立，除此而外，呂靜還有下列兩個地方值得注視：

1. 顏之推《家訓·音辭篇》提到呂靜韻書的分韻時說他“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韻，爲奇益石分作四章”。細睽顏氏評注似在指稱呂靜分韻發生錯誤。其實顏氏自信太過，拿一個標準去衡量另一個標準。呂靜事實上是的然有據的，益石分韻正是魏晉押韻有別的反響（周祖謨1966）。陸氏《切韻》大約聽從“多所決定”的顏之推的個人意見，而把“益、石”含在“昔”韻。福建閩方言所見昔韻音讀普遍可以見到 -iak，-iok 兩類讀法。以永春方言（林連通 1987-88）爲例：益 iaʔ，石 tsioʔ。這類音讀區別可以說是魏晉以上的古音之延續。顏之推亦非無據，他的“合韻”基礎乃是客贛方言體現的古音現象：-iak (Chang, K-Y 1987)。

2. 王韻小注也顯示，呂靜《韻集》的另一個特點是：皆與齊同，麥與錫同；

也就是二等與四等同韻。“街、雞”在潮陽方言同音 koi33，在廈門方言同音 kue55。廈門方言另有“關、縣” kuaī55、kuaī33 同韻的例子。（參看 K. Y. Chang 1986; 1987; 1988）。這類音讀現象罕見於其它漢語方言。

從福建移民史去推測，這種音讀特點也許是永嘉之亂隨南遷的移民帶到福建來的，起源時地為西晉中原一帶。永嘉之亂發生在公元 311 年。以此為據，那麼這一層音讀流傳至今已有一千六百年的歷史。

3.4 客贛方言層

上述三個音韻層次是從漢語方言的地理演變類型和古代文獻材料兩方面參酌決定的。在這三個音韻層次之外，閩方言學者都從實際工作經驗裡認知到客贛方言似乎對閩方言的形成與發展起過一定的作用，然而論證起來千絲萬縷，難以做成公式化的說明。

明代王世懋《閩部疏》謂：“建邵之人帶豫音”，意思是說閩西北一帶的人說話帶有江西腔（“豫”當指豫章即今南昌）。從今音看起來，閩西北方言與江西方言還有不少相似之處。舉例言之：

(1) 古透 (*th) 定 (*d) 兩母字讀喉擦音 h- 的現象，既見於江西東部南城、臨川、南豐等地，也見於福建西北。臨川“偷、頭”讀 hēu，建陽“態、疊”讀 hai, ha。

(2) 古清 (*tsh) 從 (*dz) 兩母字讀舌尖送氣塞音 th- 的現象，既見於江西也見於福建西北。江西南豐“菜” thai, “坐” tho; 建陽“菜” thai, “臍” the; 邵武“青” thang, “坐” thoi。

(3) 建陽縣黃坑鄉九峰村方言古全清、次清聲母有調類分化傾向。平聲全清“低” tei455, 次清“梯” thei53; 上聲全清“底” tei53, 次清“體” thei31。這種因送氣與否影響下的調類分化較常見於江西方言，例如安義、都昌土塘…等，都有同類現象，可能來自江西方面的影響（李如龍 1987）。

閩東、閩南地帶也有若干比較特殊的音讀，可能跟客贛方言有關係。

(1) 梗攝二等舒聲在福州方言一般讀 -aing 或 -eing。例如“猛 maing33, 更 kaing242, 硬 ngaing35, 杏 haing242, 行 haing242; 冷 leing33, 耕 keing55”。但是另有一讀 -ang, 如“彭 phang 51, 膨 phang51, 生 sang55, 坑 khang55”。入聲部份，福

州一般讀 -aik 或 -eik，例如“百 paik24，白 paik24，客 khaik24，隔 kaik24；宅 theik35，麥 meik35”。此外又有 -ak 一讀，例如“百 pak 24 伯 pak24，白 pak35，麥 mak35，隔 kak24，冊 tshak24”。其中 -ang/k 與客贛方言白讀最為近似。例如台灣苗栗客家話“猛 mang 13，硬 ngang55，行 hang22，彭 phang22，生 sang13，冷 lang13，坑 hang13，隔 kak3，麥 mak5，伯 pak3，冊 tshak3”。梗攝二等舒聲在閩南白讀為 -ē（潮系方言），-ī（漳泉系方言），未見 -ang；然而入聲部份白讀除了 -eʔ 之外，又有 -aʔ，如廈門“拍 phaʔ32，魄 phaʔ32”。

(2) 殷韻字客家話讀法在漢語方言間是獨樹一幟的。例如“勤 khiun22，芹 khiun22，近 khiun13，欣 hiun13”。這種韻母在閩南方言分為兩派讀法：一派以廈門方言為代表讀 -un，例如“斤 kun55，筋 kun55，勤 khun24，芹 khun24，近 kun33，殷 un55”；一派以漳州方言為代表讀 -in，如漳平“斤 kin24，筋 kin24，勤 khin11，芹 khin11，近 kin53”。閩東福州方言讀 -yng，如“斤 kyng55，筋 kyng55，勤 khyng51，芹 khyng51，欣 hyng55，殷 yng55”。閩西北建陽，建甌方言也有類似於福州的韻母形式，不贅舉例。

除了以上五項語音近似點之外，還有三個普遍見於閩客方言的語音現象：古全濁聲母清化平仄皆送氣，古知組讀舌尖塞音，非組讀雙唇塞音。在這三個共通現象當中，後兩個現象應該視為古音的共同繼承，難以肯定是方言彼此間的相互影響。至於古全濁聲母清化平仄皆送氣的現象，閩語可能受了客贛方言的影響。在那些能夠辨析音韻層次的單字音讀中，廈門方言都顯示不送氣的讀法。例如反映古中原層的 -aī 在廈門市郊地名“殿前” taī33，tsaī24 中古全濁聲母皆不送氣：“殿”屬定母去聲，“前”屬從母平聲。與古江東層 -ī/iʔ 一起出現的古全濁聲母也都不送氣，如“錢 tsī24，纏 tī24，碟 tiʔ4”：“錢”屬從母平聲，“纏”屬澄母平聲，“碟”屬定母入聲。與文讀層韻母一起出現的古全濁聲母也都讀清不送氣，如“殿 tian33，前 tsian24，錢 tsian24，纏 tian24，碟 tiap4”。在這些規律性強的音讀現象之外，還可見到平、仄都讀送氣的情況。其中平聲字讀送氣不足為證，因為類型特點並不明顯，比方是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那一類？還是平仄皆送氣那一類？因此，我們只能專注仄聲字尤其是入聲字的音讀現象，其中廈門方言“賊”字白讀 tshat4，“讀”字白讀 thak4 一類現象不能不引起我們特別的注意。要解釋這類鄰接方言中的共通

現象，我們不用“區域特徵”(areal feature)的說法^(註5)，“區域特徵”只是描述或概括現象，不具解釋能力。閩方言與客贛方言的關係除了地理鄰接這一靜態因素之外，我們覺得還有幾個因素應該合併考慮。例如初唐時期到閩南來鎮“蠻”(即畚族)的陳政，陳元光父子及隨從軍校多係河南光州固始縣人，此地也正是客家人的起源地之一(羅香林 1933: 63)。這是就歷史來由說明閩與客方言人口的共通成分。其次是“客、贛方言人口的閩化”，就是由於地理鄰接，早期的客贛方言人民在福建境內不斷接受閩化，改說閩語猶帶客贛方言色彩。這一現象在福建西北早成事實——第三世紀吳人越仙霞嶺南下，江西方面約略同時也有人口越武夷山東來，因此有人認為閩西北方言是古吳語和古贛語融合而成的(王育德 1970)，贛人東來可能是持續不斷的過程，至明代“建邵”之地猶帶豫音，甚至今天還見江西腔。“福佬客”一詞的流傳似乎也透露著客家人福佬化改說閩語的訊息。此詞聞見於台灣，但現象可能遍及於閩域。這個推測主要得自“畚客閩化”的啓發。畚族目前約有三十六萬(1982年統計)人口分佈在浙江西南與閩東，內部使用的客家話(傅國通等 1985)係十世紀前後客家南來“畚客”雜居混化^(註6)的結果。十四世紀以前畚族的

(5) 橋本萬太郎(1978)《言語地理類型論》對“區域特徵”有段話說得相當精闢。橋本說：

“區域特徵”這個術語有點危險。遇上這種現象，追問它是怎麼產生的，闡明它的內在機制，本來應該是語言學的任務。可是有了這個術語，往往滿足於把這些現象看做“區域特徵”就完了。這不是反而束縛了探索者的手腳嗎？正是因為這個理由，筆者曾在國際漢藏語言學會上提議廢止“區域特徵”這個術語。詹姆士·馬蒂索夫教授(Prof. James Matisoff)也說，確實存在容易把它理解成“氣候”或“風土”這樣地區特徵的危險。廢止這一術語的目的也就在此。(余志鴻 1985:30-31)

(6) 羅香林在《客家研究導論》(1973:74)談到畚族的漢化情況說：

客家是自北南遷的民系，當其輾轉奔投的時候，自然免不了要受種種自然淘汰與選擇作用的規範，衰老的，弱小的，不容易達到安全的境地，就是身體不很結實的女人，也不容易與男子一同奔避，結果能夠到達目的地的，十之八九都是精力較優的丁壯，就中其有原日妻室能同時履止的，自然不必遽與土著通婚，但其他沒有原日妻室同時履止的，那就只好降格以娶土著婦女了。客家先民所以不能不與畚民混血的，大概就是這個緣故。

次頁(1933:75)說到未混化的情況云：

畚民因須與客家盛營貿易的緣故，漸漸習染客人的語言和文化，久而久之，遂把他們固有的語言都消失了。

家鄉如今遺有不少畚字地名^(註7)，十四世紀前後畚族大規模遷居時，不少畚族人未遷，逐漸閩化終於改說閩語。畚族漢化有兩個例證。從姓氏上說，“有史可考的畚民的姓氏，除了現在藍、雷、鍾三姓之外，還有陳、李、黃、謝、劉、邱、羅、晏、張、余、袁、聶、辜、章、何、梅、苗、朱、簍、鼓、患等二十多個姓。這些姓氏在現在畚族中已經不見了，這是歷史上畚民被漢化的明證”（蔣炳釗 1983:79）。

(7) 筆者在〈福建畚字地名與畚話〉一文曾據《福建省地圖冊》（福建省地圖出版社，1982）摘出，為便於檢索，不避重複轉錄如下：

永泰：畚地、長畚

屏南：葛畚

連江：利畚

崇安：周畚、社畚、仕畚、畚頭、吳家畚

浦城：社畚、周公畚

建陽：墟埭（是否跟畚字有關未詳，姑錄備考）

建甌：大東畚

松溪：銅畚、獅畚、東畚、下畚、葛畚、烏木畚

政和：下畚

三明：吉畚

永安：三百畚、浮流畚、北羅畚、洋畚、三畚

南安：壩頭畚、下畚

安溪：中隴新畚、崎畚

德化：仁金畚

雲霄：上梨畚、下梨畚、桃畚

詔安：火畚

平和：后畚、畚坑

南靖：大林畚、桂竹畚、上麻畚、后畚

華安：官畚

龍岩：高畚、郭畚、羅畚、下畚、洋畚、丹畚、畚背、下經畚

漳平：百種畚、羅畚、謝畚、下畚

尤溪：下畚

永定：段畚、大畚里

上杭：大畚

武平：坪畚、米篩畚、黃心畚

長汀：畚心、黃麻畚、姜畚坑、下畚

連城：何畚、堯家畚、湖佰畚、江畚、楊公畚、蘆公畚、畚部、仔畚、李家畚

明溪：吾東畚、芋畚

清流：禾畚坪、林畚

寧化：洋畚、增畚、上畚、大畚

順昌：畚村尾

邵武：下畚

以上畚字地名有二十九個見於閩南方言區（南安到尤溪），二十九個見於客家話地區（永定以下），兩區已佔全數之大半，佐以歷史文獻可以推知應為畚族早期較密集的聚居地。

詞彙上有一個饒於興味的現象：閩中永安、沙縣地區的漢語方言用“丈夫畚、阿娘畚、囡仔畚”表示“男人、女人、小孩”（李如龍·陳章太 1985:137）。問題是為何不用“人”字而偏用“畚”字呢？推測起來，起初可能具有區別作用。凡說“丈夫人、阿娘人、囡仔人”係指漢人的，漢人別造“丈夫畚、阿娘畚、囡仔畚”用以指稱畚人。畚人漢化改說漢語，不審詞源逕行襲用。這是語言成份在隱然間所透露的畚人漢化的例證之一。上述兩則例證可惜都不能說明有無“客家化”這一階段中介。不過，也不能因此排除先經客家化再經閩化的漢化過程。否則不易解釋浙江西南、閩東以及其它地方畚族人口客家話的由來。

總起來說，閩方言內部古全濁聲母清化平仄皆送氣的現象（李如龍 1985），有一部份的原因是客贛方言閩化的結果造成的。這一細水長流、積漸而然的現象，使閩方言性質複雜化，因此難以用公式化的辦法做具體的說明。除非滿足於膚淺的、立即而明顯的音韻表徵，要探究閩語的形成與發展就不能不兼顧地理條件提供的人口變動情況。這一類方言關係的討論已無法完全從語言成份考究，而應同時照顧歷史與社會環境。

四、結 語

閩方言音韻層次的探討在工作性質上有如考古學者從事地下挖掘。就古蹟存留而言，時代越晚近遺跡也越多，時代越古老遺跡也相對減少。明白這個道理，我們就無由要求每個層次存留量的均等。假使每個層次都有同等份量的蘊藏，層次分析也早就不辯自明，無待今日的考證。我們甚至可以說，例證但看有無闡發價值而不在數量多寡。就像考古地下挖掘一樣，鑽探工作只能在定點範圍內進行，而不可能在全中國縱橫數千公里的領土內全面且同時地進行。在一個定點內往下挖掘，才可能獲得年代層次的相對值。不在一個定點內去透視相對年代，根本上是沒有理據的。假使不具類似的觀念，探討音韻層次就不可能獲得什麼具體的結果。

更進一步說，假使承認所有現代的人類都是從原始人脫胎換骨蛻化而來這個命題，那麼所有現代漢語方言漢字音讀都是從漢字發展初期演化而來，就是明顯不過的事實。有了這樣的了解，我們就不會輕易相信某人是原始人，某某音是上古音。拿一個音去說它來自上古音，從而證明該方言形成於上古時期，其實是兩回事。這

一點從閩語形成與發展過程中音韻層次的累積可以具體加以說明。

一個音韻層次是一個“面”，也就是一個語音系統，而不是一個“點”或一條“線”的現象。所謂“面”也就是如同考古學所謂的“層位”。音韻層次分析所見點或線的現象，其實是一個個不同的“面”的縮影。換句話說，每個面都只留下具有特點的部份，因此今天難以“全面”復原，只有從局部的面去推測。從“面”萎縮到“線”或“點”，主要的原因有“層次重疊”和“取代作用”。每一個面代表一個語音系統，來自不同的時代和地域。時代問題仰賴福建開發移民史和文教推廣史去探討，地域問題則依據漢語方言地理演變類型。從這兩方面參酌，我們認為閩方言含有四個音韻層次：古中原、古江東、唐代通語、和客贛方言層。所謂“閩方言”就是這四個方言演變類型的綜合體。

閩方言音韻層次的分析對漢語發展史的研究具有相當重要的啓發性。約而言之，以下數點有不能已於言者：

(1) 時代和地域：從方言地理演變類型的特點看起來，時代問題就相形次要了^(註8)。從唐代通語（文讀）到江東層相距不過四百年；從江東層到古中原層不過兩三百年。層次之間的差異主要是地域來源，也就是演變類型的差異。那些差異在進入閩境以前早已存在。這個現象充分說明了方言地理類型的穩固性（史存直 1981:91; 1985:31）即使歷經千年也沒有什麼變化。從上古漢語到中古漢語之間存在著比時代差異更大的方言差異、性質差異（K. Chang 1974；橋本萬太郎 1978）。只重時代差異而漠視方言地域差異的漢語語音史一定不免於扭曲事實真相。

(2) 綜合與折合：關於語音系統綜合性的問題，前人的看法每每舉棋不定。例如袁家驊（1983:2-3）一則說：“包羅古今南北的一個語音系統是很難想像的……”同書談到《切韻》時卻又說（1983: 20）：“二〇六韻部大概是綜合古今參照南北而有所取捨，未必是一時一地的語音。”邵榮芬（1982:1-3）只承認“折合”而不信語

(8) 關於層次的時代問題，常常不易肯定。例如周振鶴·游汝杰（1986）談到閩語的有幾處，一則說：“閩語的主要淵源是東漢末三國時期的吳語，因為福建的漢人主要是這一時期開始從江浙一帶遷入的”。（頁15）同書在引用羅杰瑞的閩語時代層次時（頁50）又認為第一種音讀（即一層）應是秦漢音。周·游兩人對此不一致的指認也有所警覺，他們說：“但是要一一確指這些特點是哪個時期的移民帶來的，卻不是輕而易舉的事。”（頁51）的確，如果不能從方言地理演變類型去決定音韻特點，時代問題的爭議必然毫無理據。只要肯定古江東層是閩語的淵源之一，那麼漢末三國說與南朝說的差別就不是頂重要的問題。一個方言演變類型既經形成，穩固下來，就很難加以改變，除非人口結構變動，文教力量龐大。今天層次分析之所以可能，並非因為音韻的時代明確，而是音韻依存的方言地理演變類型明確。

音系統可以綜合。其實文白異讀、音韻層次的存在，就是語音系統“綜合”的具體證明。如果兩個語音系統相互折合，即無所謂文白異讀，從而音韻層次分析也失其理據。

(3) 古閩語重建：關於古閩語重建，首先要問：什麼是“古閩語”？經過層次分析，已知閩語的形成與發展有來自不同時代、源於不同地域或方言演變類型的音韻內容。把這些不同的音韻內容還原到其起源地，結果是空無所有，如果還有殘餘只不過是些有音無字來源未明的成分。如此說來，什麼是“古閩語”呢？（參看李如龍 1985: 148）的確，要在疊床架屋的音韻層次中為古閩語劃下一道界線並給予定義，那是困難重重的。過去，古閩語的錯誤觀念就在於承認現代閩方言是從單純且內部一致的原始閩語分化而來，也就是採取“譜系樹”(Stammbaum)的觀念。然而音韻層次的存在卻表明閩方言的發展實際上只能從“波傳擴散”(Wellentheorie)的角度去說明。有趣的是，不管是譜系分支還是波傳擴散，當我們把一個漢字的幾種音讀擺在一起時，我們是在重建漢字的古音，而未必是古閩語。這就好比拿吳語、客贛方言、官話方言去做比較決定古音形式一樣。假使我們的目的是要顯示閩方言音讀的地域來源，那麼有多少層次就有多少相應層次的古音來源，三個層次就應說三個來源。假使我們的目的是要利用不同的音讀去決定原始形式，那就只能為每一個漢字設定一個音讀，把不同層次的音讀當做不同演變的結果。

參 考 文 獻

A · 中 日 文 著 作

- 王太慶 1983 〈銅陵方言記略〉《方言》99-109
 北大中文系 1962 《漢語方音字匯》文字改革出版社
 史存直 1981 《漢語語音史綱要》商務印書館
 史存直 1985 《漢語音韻學綱要》安徽教育出版社
 余志鴻 1985 《語言地理類型學》北京大學出版社（譯）
 江蘇省和上海市方語調查指導組 1960 《江蘇省和上海市方言概況》江蘇人民出版社
 李永明 1984 《衡陽方言詞彙》湘潭大學學報編輯部
 李永明 1988 《臨武方言》湖南人民出版社
 李如龍 1981 〈八音定訣的初步研究〉《福建師大學報》4:110-121
 李如龍 1985 〈中古全濁聲母閩方言今讀的分析〉《語言研究》8:139-149
 李如龍 1987 〈福建方言聲調分化的模式〉中國語言學會第四屆學術討論宣讀論文

- 李如龍·陳章太 1985 〈論閩方言內部的主要差異〉《中國語言學報》第二期:93-173
- 李濟源·劉麗華·顏清徽 1987 〈湖南婁底方言的同音字彙〉《方言》294-305
- 吳守禮 1948 〈福建語研究導論—民族與語言〉《人文科學論叢》第一輯:125-194
- 林連通 1987-8 〈福建永春方言詞彙〉《方言》310-316,75-78
- 邵榮芬 1982 《切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金夢茵 1983 《陵川方言志》山西省方言志叢刊
- 周因夢 1956 〈博聞強記的郭璞〉《中國語文》7:39-43
- 周振鶴·游汝杰 1986 《方言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 周祖謨 1966 〈切韻的性質和它的音系基礎〉《問學集》434-473
- 袁家驊 1960 《漢語方言概要》文字改革出版社 (1983二版)
- 高福生 1988 〈安義方言同音字彙〉《方言》123-135
- 侯精一 1986 〈晉語的分區(稿)〉《方言》253-261
- 張琨 1985 〈論比較閩方言〉《語言研究》8:107-138
- 張琨 1987 《漢語音韻史論文集》聯經出版社
- 張光宇 1984 〈說邵武方言〉《漢學研究》2.1:109-116 (署名張賢豹。轉載於《語言研究》8:144-147·署名雷伯長1984)
- 張光宇 1985 〈切韻純四等韻的主要元音及相關問題〉《語言研究》9:126-137 (署名張賢豹)
- 張光宇 1987 〈從閩語看切韻三四等韻的對立〉《師大國文學報》16:255-269
- 張光宇 1988 〈福建畚字地名與畚話〉《國立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論文集》237-261
- 張光宇 1989a 〈海口方言聲母的由來〉《方言》40-46
- 張光宇 1989b 〈閩方言古次濁聲母的白讀h-和s-〉《中國語文》(即刊)
- 張光宇 1989c 〈吳楚江淮方言連續體〉(未刊稿)
- 張盛裕 1979 〈潮陽方言的文白異讀〉《方言》241-267
- 張盛裕 1981 〈潮陽方言的語音系統〉《方言》27-39
- 張振興 1982 〈漳平(永福)方言同音字匯〉《方言》203-228
- 陳寅恪 1956 〈述東晉王導之功業〉《中山大學學報》163-175
- 陳承融 1979 〈平陽方言記略〉《方言》47-74
- 陳章太·李如龍 1982 〈論閩方言的一致性〉《中國語言學報》1:25-81
- 陳昌儀 1983 〈都昌(土塘)方言的兩個特點〉《方言》248-259
- 陳慶延 1988 〈古全濁聲母今讀送氣音的研究〉第廿一屆國際漢藏語言學會議宣讀論文(瑞典龍德大學)
- 黃典誠等 1982 《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香港三聯書店
- 黃典誠 1984 〈閩語的特徵〉《方言》161-164
- 傅國通等 1985 《浙江吳語分區》浙江省語言學會
- 喬全生 1983 《洪洞方言志》山西省方言志叢刊
- 詹伯慧 1981 《現代漢語方言》湖北人民出版社
- 楊時逢 1982 〈江西方言的內部紛歧現象〉《清華學報》14:307-326
- 潘茂鼎等 1963 〈福建漢語方言分區略說〉《中國語文》475-495
- 蔣炳釗 1983 〈福建畚族的族稱、源流和遷徙〉《福建論壇》2:75-80
- 顏森 1982 〈高安(老屋周家)方言詞彙〉《方言》66-80,156-160,234-240
- 羅常培 1933 《唐五代西北方音》上海
- 羅常培 1958 《臨川音系》科學出版社
- 羅香林 1933 《客家研究導論》(台灣古亭書屋重印)
- 王育德 1970 〈福建の開發と福建語の成立〉《日本中國學會報》123-141

- 平田昌司 1986 〈漢語閩北方の第九聲調（陽平乙）の性質〉《山口大學文學會志》37:1-20（重稿題做〈閩北方言第九調的性質〉《方言》12-24, 1988）
- 橋本萬太郎 1978 《言語類型地理論》東京弘文堂

B・西文著作

- Bielenstein, Hans. 1959. "The Chinese colonization of Fukien until the end of Tang." *Studia Serica Bernhard Karlgren Dedicata*: 98-122.
- Chang, Kun. 1972. *The Proto-Chinese Final System and the Qieyun*.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 Chang, Kun. 1974. "The Ancient Chinese phonology and the Qieyun."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9.1-2:1-26.
- Chang, Kuang-yu. 1986. "Comparative Min Phonology." Ph. D dissertation, U.C. Berkeley.
- Chang, Kuang-yu. 1987.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eng Rhyme-group in Southern Chinese."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28: 43-52.
- Chang, Kuang-yu. 1988.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Qieyun Grade I and Grade II final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Oct 7-9, Lunds Universitet, Sweden.
- Downer, G.B. 1973. "Strata of Chinese loanwords in the Mien dialect of Yao." *Asia Major* 18:1-33.
- Norman, Jerry L. 1969. "The Kienyang dialect of Fukien." Ph.D dissertation, U.C. Berkeley.
- Norman, Jerry L. 1973. "Tonal development in 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2: 222-238.
- Norman, Jerry L. 1974. "The initials of Proto-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1: 27-36.
- Norman, Jerry L. 1979. "The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Min dialects." *Fangyan* 268-274.
- Norman, Jerry L. 1981. "The proto-Min final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pp. 35-74.
- Norman, Jerry L. 1986. "What is a Kejia dialect?" Paper presented at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Taipei.
- Sagart, Laurent. 1984. "Le destin des obstruents sonores des Chinois ancien dans dialects Min." *Cahier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13.1: 91-99.

ON THE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MIN

KUANG-YU CHANG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As is well known, the Min dialects present one of the most complicated problems with respect to the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Chinese dialectology. It is the author's view that a layer is a type of change. Based on the Amoy dialect, together with historical documents as well as dialect geography, the author discovered that there were four discernible source dialects which formed what was later called Min dialects, they are: (1) the ancient Central Plain or Zhongyuan (中原), (2) the ancient Wu-Chu-Jiang-Huai or Jiangdong (江東), (3) the Tang-Song literary tradition and (4) the Hakka-Gan dialects. In addition,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following three issues.

(1) The evolutionary types found in different dialects are fairly stable. It is this stability that makes the analysis of the so-called chronological strata possible. From the archaic to the middle periods there has been greater dialectal divergence than chronological differences.

(2) The existence of the literary/colloquial distinction entails the possibility of a composite phonological system — when a layer entered into an old one, it did not need to be readjusted. If there was readjustment, there would be no strata problem.

(3)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o-called proto-Min could be done for two different purposes.

In order to show source dialects, one should give each layer a proper proto-form; while to reconstruct character readings, each character can only be given a single proto-form, no matter how many readings a character might have in different layers.